

關於耶穌會士於澳門・長崎的生絲貿易中的利潤考述

劉小珊 *

摘要 新航路的開闢為葡萄牙的亞洲拓展提供了客觀條件。葡萄牙商人和耶穌會士的到來，開始了日本近世史上極為重要的中日葡貿易。即以中國澳門為貿易中轉站，葡萄牙商人將中國的商品源源不斷地運往日本。其中最為重要的交易品當屬中國的生絲。日本耶穌會為了籌措經費維持在日傳教事業的生存和發展，不顧聖職者身份參與到世俗的生絲貿易中來，並從中獲得了可觀的利益，為日本教會提供了足夠的資金。日本耶穌會的參與使原本單純的貿易染上了特殊的色彩，也給教會本身，生絲貿易交流地日本長崎和中國澳門，乃至日本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 耶穌會士；澳門生絲貿易；葡萄牙商人；長崎港積聚地；貿易中轉地

日本近世與明朝政府的堪合貿易中止後，處於大海航時代巔峰期的葡萄牙成為日本新的貿易對象。然所謂的日葡貿易，並非是日本與葡萄牙進行兩地商品直接的交流。日葡貿易實乃為中轉貿易，即以澳門為商品中轉站，葡萄牙商人源源不斷地將中國的商品運往日本。故也可稱之為中日葡貿易。若僅就商品交流地而言，實質上只是中日貿易。如果從參加的直接對象來看則為日葡貿易。歷來，歷史學家們把這個特殊的貿易定義為中轉貿易，即以澳門為中轉貿易的中心地，將中國澳門以外的商品通過此地運送至日本。在所有的商品中，最為重要、繁榮的當數中國的生絲。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最重要的生絲進口貿易港為日本的長崎。因此，日葡生絲貿易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澳門與長崎之間的生絲貿易。

這場貿易的參與者，除了葡萄牙商人和日本商人（包括幕府和大名）外，還有另外一個角色起到了極其關鍵的作用，那就是日本耶穌會。日本耶穌會士們利用自身之便，以仲介者，

甚至直接參與者的身份左右着日葡生絲貿易。耶穌會士們為了籌措傳教經費，不顧自身聖職者的身份傾心於世俗的生絲貿易，給日本耶穌會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在這場以大航海輝煌色彩為背景的貿易中，葡萄牙商人和日本耶穌會成了恢弘歷史畫卷中不可或缺的景色。

澳門和長崎的歷史離不開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和耶穌會士在澳門和長崎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隨着新航路的開闢，處於大航海時代巔峰的葡萄牙積極地開拓亞洲新世界，登陸中國澳門，並最終將觸角伸向了當時被譽為“世界盡頭”的日本。天主教傳教士們也跟隨商船的脚步，將“福音”帶入兩地。

實際上，葡萄牙人早在 1543 年便發現了日本。三名葡萄牙商人漂流至日本種子島，並和種子島主時堯做了最初的貿易交易，將隨身所帶的火槍售予對方。在當時，葡萄牙人便對日本的經濟地位以及其大量的白銀擁有量有了初步的了解，此後積極謀求在日通商。因此，葡萄牙在中國沿海建立貿易基地的野心進一步加強了。而地理位置優越的澳門恰恰給葡萄牙人提供了絕佳的機會。澳門逐漸成為葡萄牙在東亞的前哨，成為中日葡三國貿易的中心地。

*劉小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東語學院日語系教授、史學博士。研究方向：中日交通史、日本歷史、日本漢學、中日文化對比研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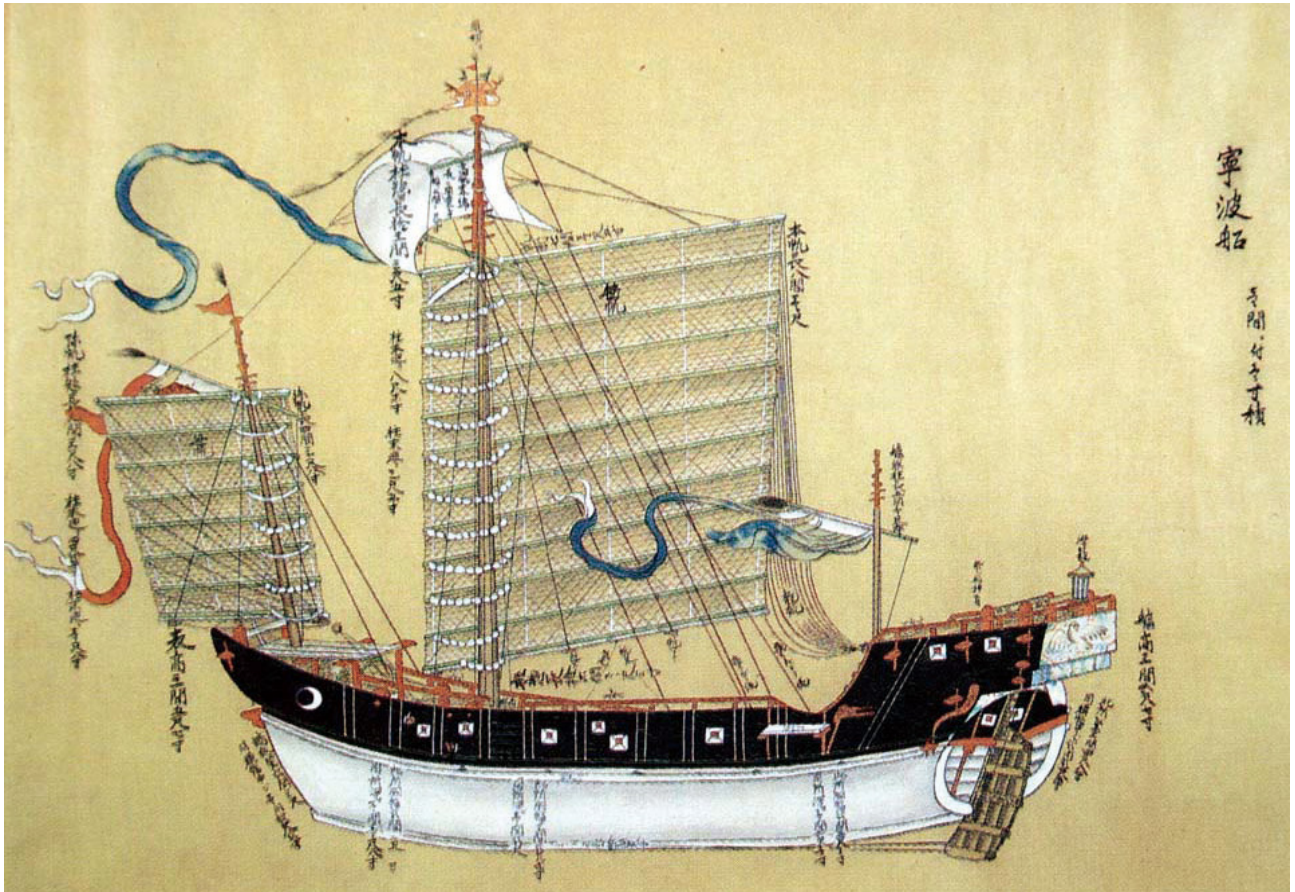


圖 1. 葡萄牙人運送生絲的商船。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各地建立要塞或商館，並將附屬於這些要塞或商館的集落跟本國內一樣稱為“市”。1582年，葡萄牙人在澳門設立市參事會，管理當地的葡萄牙人以及商業貿易。1569年，設立阿爾馬薩（Armação）組織，這個組織也可以稱之為公司，主要負責生絲貿易。日本耶穌會就是通過阿爾馬薩從澳門獲得生絲貨源的。隨着阿爾馬薩的成立，澳門的生絲貿易進一步走向系統化、組織化以及壟斷化。澳門市¹也依靠生絲貿易的獲益進一步鞏固和提高了其貿易中轉地的地位。由阿爾馬薩提供的生絲，通常由甲比丹·莫爾（Capitão-mór）²的船隊運送至貿易地。甲比丹·莫爾的船隊將貿易對象擴展至日本，源源不斷地將生絲運送到日本重要貿易港—長崎，而澳門也因生絲貿易逐漸地繁榮起來。

在葡萄牙海上勢力的保護下，以澳門為中轉站的中日葡貿易成為了當時東亞海上貿易極為重要的一環。尤其是明朝實施海禁以後，澳門的中轉地地位更是進一步突出，直接承載了中日兩國貿易。澳門和長崎兩地貿易的順利進行是保障澳門這個商業基地繁榮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葡萄牙商人們積極地參與到這場貿易中來。“當葡萄牙人從澳門去日本的時候，總是攜帶很多的白綢、黃金、麝香和瓷器，他們從日本只帶回白銀。他們有大帆船，每年都去那裡，再從那裡帶來六十多萬銀幣。所有這些日本銀幣，再加上他們每年從印度掙到的二十多萬銀幣，全部都用來在中國謀取更大的利益，以及其他貴重的東西”³。也就是說兩地的貿易體系大致如下：葡萄牙人先從日本獲得大量的白銀，再把這些白銀當做對中貿易的重要資本。

傳教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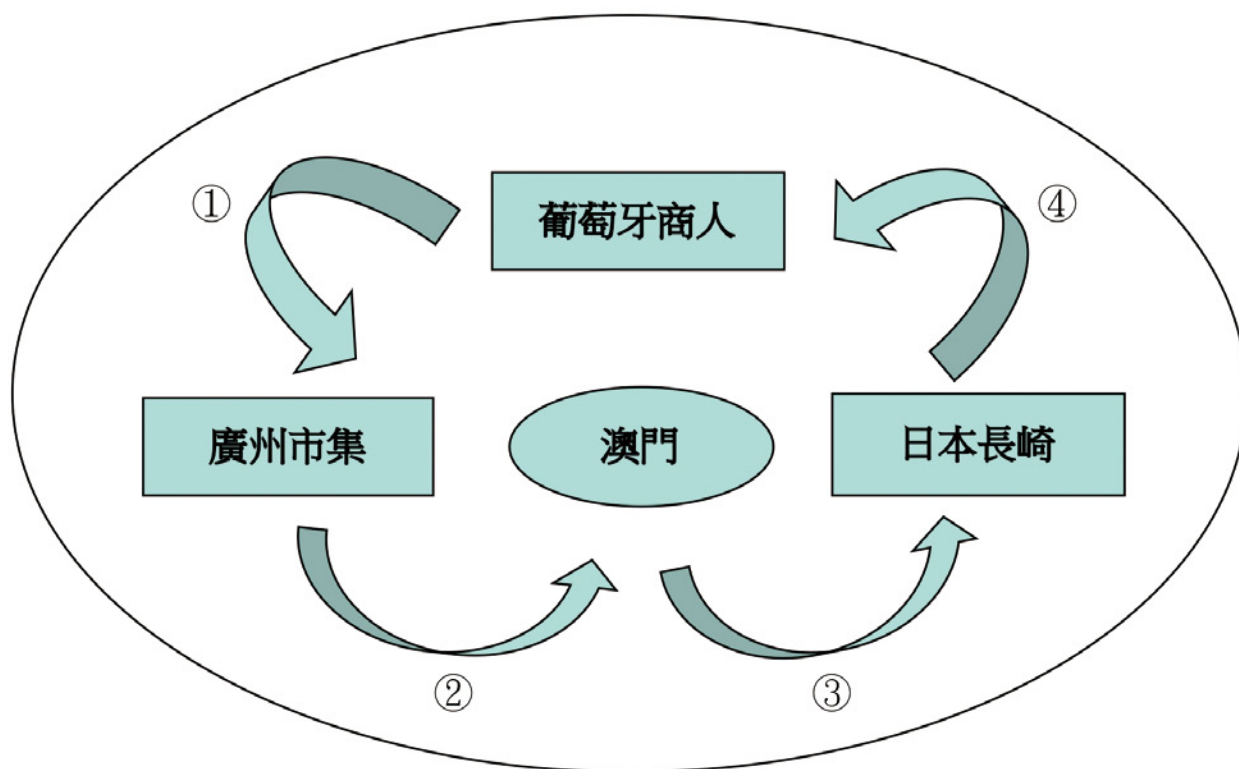


圖 2. 葡萄牙・長崎・澳門三者的關係。

他們利用從日本籌措的白銀購買中國的商品，以換取日本白銀為目的，將火槍、火藥、香料以及最重要的中國生絲大量的送入日本。簡單來說，就是“從日本獲得白銀，用白銀換取中國生絲，將中國生絲售往日本”，然後再從日本獲得白銀，如此循環往復，謀求最大利益。澳門作為這一貿易的中轉地，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關於貿易中三者之間的關係，筆者在圖 3 中詳細列出，並加以說明。

說明：① 葡萄牙商人從廣州市集（中國）購入貿易商品。② 將在中國購入的商品運往中轉地澳門。尤其是中國的生絲由專門的阿爾馬薩公司管理銷售。③ 將貿易商品從澳門運送至長崎。④ 從長崎（日本）獲得白銀，重新回到①。

從圖 2 可知，澳門在中國市場、澳門市場上都起着十分關鍵的作用，扮演着商品積聚地

和發散地的角色。因此，隨着葡萄牙海上勢力的衰微以及對日貿易的終結，澳門的經濟地位也會日趨衰退。無論如何，澳門在日葡生絲貿易中起的作用是無法忽視的。

日葡生絲貿易的另一個重要交易地便是日本的長崎。長崎位於日本九州西北部，是最靠近亞洲大陸的日本海港，一直以來都在日本的對外貿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日本耶穌會的支配下，這一座天主教城市作為南蠻貿易和天主教傳播的根據地繁榮至極，即使經歷了 1578 年豐臣秀吉的禁教，1639 年日本統治者的鎖國，仍然發揮着對外貿易港的重要作用。

1549 年，耶穌會進入日本後，決定將基督的榮光在這個國家傳播開來。會士們利用傳教與貿易一體化的方針，獲得在日傳教的許可，在短期內便得到了許多信徒。甚至一些九州大

名，或出於信仰，更多的則是因為貿易利益都對耶穌會士們持歡迎態度，有的自己也成為了天主教徒。1579年，大村氏正式提出將長崎和茂木兩地捐贈給日本耶穌會。當時正在日本巡察的巡視員范禮安在慎重考慮後，接受了大村氏的捐贈。從此，長崎便成為了日本耶穌會的領地，一直到1578年被豐臣秀吉收回為止。

接受大名的捐贈後，日本耶穌會便在長崎設立了管理財務的司庫，專門負責耶穌會的商業活動。長崎管理財務的司庫的設置，說明了長崎已成為耶穌會重要的經濟用地。日本耶穌會積極地將葡萄牙商船招至長崎，自身也積極地參與到生絲貿易中來，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那麼，作為聖職者的耶穌會士不顧身份大膽地參與到世俗的商業貿易中來內在的原因是甚麼？解決這一問題，首先有必要對當時日本耶穌會的財政來源和經費支出情況作一考察。

二

在日本耶穌會參與生絲貿易之前，其主要的財政來源基本上都是依照耶穌會傳統方式的所得，可稱之為“合法性”收入，以區別日本的貿易收入。日本耶穌會的“合法性”收入主要有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兩種。

固定收入主要包括：

(1) 葡萄牙國王每年給予的固定經費（國王年金），約2,000杜卡多（Ducato）⁴/年；

(2) 教皇每年給予的固定經費（教皇年金），約6,000杜卡多/年；

(3) 日本耶穌會從其所擁有日本國內外的土地所得的各類收入（包括地租和稅收等等）。

而非固定收入主要是指一般信徒的捐贈。

日本耶穌會的“合法性”收入可否支撐其在日本的傳教事業呢？首先，信徒的捐贈不僅

數量上非常有限，而且也非常缺乏穩定性，根本不能當作有效的財政來源。尤其是日本的信徒大多是處於社會底層的貧苦百姓，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給予教會過多的施捨。以常理推斷，舊教國的葡萄牙商人每次前往日本進行貿易的時候，多少會對耶穌會有所捐贈，但是關於葡萄牙商人的捐贈在耶穌會的相關報告中，並沒有過多的記載，其中最為明確且金額最大的是1556年修道士阿爾梅達在日本加入耶穌會時的捐贈，約四千至五千克魯紫多（Cruzado）⁵。顯然，相對於日本教徒，葡萄牙商人的捐助要多得多。但是，葡萄牙商人的捐贈也非常不穩定，且數量上並非都如阿爾梅達捐贈一般巨大。信徒的捐贈不可能支撐起耶穌會的在日傳教經費的需求。

其次，在固定收入方面耶穌會的情況又如何呢？葡萄牙國王和教皇的固定年金金額是巨大的，如前文所述兩者加起來每年約有8,000杜卡多，這對於日本耶穌會來說是一筆非常重要、且十分可觀的經費來源。然這兩筆經費在途中或被挪作他用，或無法按期支付給日本耶穌會的情況非常多見，甚至是葡萄牙國王和教皇根本沒有按承諾實現撥款，二者年金的允諾其實早就如一紙空文。關於這一點，耶穌會士們的信件中亦有記載。

范禮安於1579年12月5日於日本口之津寄給總會長的信中如此寫道：

國王六年前曾允諾每年在麻六甲支付日本一千克魯紫多，但是迄今為止一文錢也沒有到賬，今後到賬的可能性更小了。⁶

范禮安指出，葡萄牙國王已經多年沒有支付相應的年金了，而且也毋須指望國王今後會主動支付。無獨有偶，教皇所應支付的年金，同樣地無法按時按量地送到日本耶穌會手中。在范禮安的書信中，曾經好幾次提到關於教皇年金的事宜。

范禮安在1587年11月20日從果阿寄給總會長的信中稱：

傳教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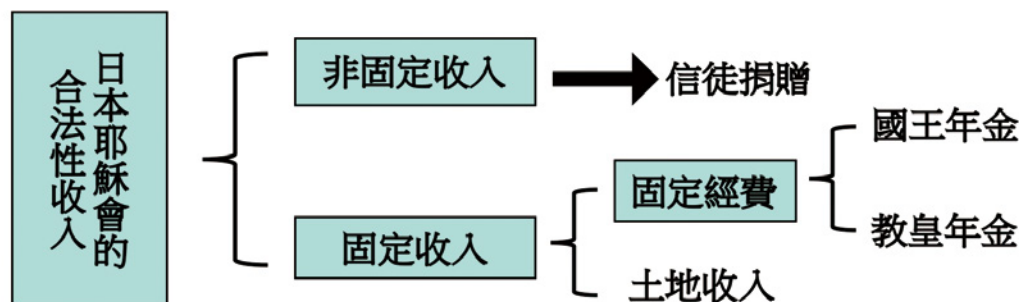


圖 3. 日本耶穌會的財政來源。

在教皇答應支付的六千克魯紫多中，迄今為止仍有四千克魯紫多仍未抵達印度。⁷

由此可知，教皇的年金中仍舊有一大部分沒有如期支付給耶穌會。范禮安在 1595 年 11 月 13 日寫給總會長的信中，再次重申了教皇並無支付年金的事實。稱曰：

提起教皇所給予的年金，正如閣下知曉的那樣，西格斯特五世只不過支付了一年而已。之後的三四年並沒有支付我們任何經費。⁸

從范禮安的信件中我們可以得知，年金的支付情況非常糟糕，日本耶穌會根本無法依靠這兩筆“高額”的“固定收入”來維持教會的生存和發展。

除了上述的兩項固定收入外，日本耶穌會的另外一個固定收入即是從其所擁有日本國內外的土地所得的各類收入（包括地租和稅收等等）。相對於龐大的經費支出，土地的固定收入也是微不足道的。日本耶穌會在日本最為重要的土地收入即為 1579 年大村純忠所捐贈的長崎和茂木兩地。耶穌會每年在兩地所徵收的葡萄牙商船停泊稅約為一千克魯紫多。⁹然而，這項收入是 1580 年以後的事情了，在此之前日本耶穌會的主要土地收入為印度的一千克魯紫多的土地收入。¹⁰隨着耶穌會在日本傳教事業的擴大，傳教經費的增加，這些土地收入的金額根本沒有辦法彌補巨大的資金短缺的鴻溝。

綜上所述，耶穌會的“合法性”收入，即年金收入、土地收入以及信徒的捐贈無法為耶穌會的生存和發展提供足夠的支撐。相對於微薄的財政來源，日本耶穌會的經費需求情況則恰好相反。根據巡察使范禮安在《日本巡察記》中的記載，日本耶穌會在日經費主要分為日常經費支出和其他經費支出兩大部分。為了更加一目了然，筆者根據范禮安的記載將日本耶穌會經費支出類型整理如下表。

日常經費	人員費
	傳教活動經費
其他經費	對被逐放至長崎的信徒的救濟費
	對貧苦信徒的補助費
	為大名和領主準備禮物的費用
	新建或改建教堂、修道院、司鐸館的費用
	新增的傳教事業經費
	對弱小的基督教大名、領主的軍事援助費
	巡察使和準管區長的旅費等費用

表 1. 日本耶穌會的主要經費支出項目¹¹。

從表 1 可知，日本耶穌會所有支出的經費是非常龐大的，尤其是隨着教會傳教事業的擴大，這些費用的金額也必定會急速增加，如何籌措相應的經費得以繼續生存和發展，成了日本耶穌會首要的問題。1549 年 8 月 15 日沙勿略初次登上日本島開教時，只是僅僅帶了一名神父，一名修道士以及日本人彌次郎及兩名隨從，包括沙勿略本身耶穌會的力量也僅為六

人而已。但是經歷了短短三十多年，耶穌會的人員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據范禮安記敘，到1583年為止，耶穌會已經在日本建立約兩百多處的教堂，這些教堂除由基督教領主建立的部分外，全部經費由日本耶穌會負擔，進行日常的管理。人員方面，筆者現階段掌握的最詳細的數據是1582年日本耶穌會的人員情況。到1582年左右，在日本共有耶穌會士84至85名，其中包括32名神父，20名日本修士。此外還有100名同宿，以及近三百名左右的小者和看坊¹²。還包括一些教會裡生活的學生和學徒，約一百多名，但是具體的人數不明。也就是說，日本耶穌會在1582年左右需要供養的人數，即需要支付費用的人員，已經達到了500名左右。¹³對比起1549年剛進入日本時，翻了約八十幾倍。

人員	人數	備註
耶穌會士	84 (5) 名	其中：神父 32 名 日本人修士 20 名
同宿	100 名	
學生、學徒	—	具體數值不明
雜役	200 名	包括小者和看坊
合計	500 名	

表 2. 1582 年日本耶穌會人員情況表。

從表 2 我們可以知道，日本耶穌會所需供養的人數是非常龐大的，而且這還不包括日本耶穌會所建立的慈善機構、教育機構裡的人員。如果連這兩項也計入其中的話，絕對不會是一個小數目。日本耶穌會的年度經費支出，單單從人員方面計算，就已經足夠龐大了，所謂的“合法收入”，即使全部按時按期到賬，也無法完全填補這個資金的鴻溝。關於耶穌會的年度支出經費的數額，高瀨弘一郎曾在其著作《キリシタンの世紀——ザビエル渡日から“鎖国”まで》（岩波書店，1993 年）中有詳細的調查，筆者根據其研究結果，將已明確的部分經費支出歸納於表 3 當中。

由表 3 可知，日本耶穌會在 1579 年前每年大概只需經費 6,000 杜卡多左右，而四年後

的 1583 年開始上升到了 10,000-15,000 杜卡多 / 年，更甚者是 1595 年後，竟出現開支經費 16,000 杜卡多的年份。即使是禁教令正式頒佈以後，日本耶穌會仍需要每年約 10,000 杜卡多的經費支出。

面對如此龐大的經費支出，以及嚴峻的資金短缺，日本耶穌會不得不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另闢蹊徑。而恰恰當時的日本就為其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解決這個入不敷出困境的機會。日本和明朝的勘合貿易中斷之後，處於大航海時代狂熱期的葡萄牙人們乘帆遠航至“世界的角落”日本，以中國澳門為據點開始了日本和葡萄牙之間的貿易。耶穌會士們看準了日本大名和領主們對貿易利益渴求的心理，以傳教為基礎，介入到日葡貿易之中，從中獲取足夠的經費來支撐日本耶穌會窘迫的財政以及更大地拓展在日傳教事業。日本耶穌會介入貿易最重要的原因如前文所分析的一樣，在極少的、不穩定的財政支援的情況下，以最有效的方式籌措在日傳教經費。

時間	支出經費	備註
1579 年以前	約 6,000 杜卡多 / 年	
1579-1582 年 (兩年零七個月)	32,000 杜卡多以上	教會、神學院等機構的新建或改建費用的增加
1583-1587 年	10,000-15,000 杜卡多 / 年	
1587 年以後	約 8,000 杜卡多 / 年	因禁教以及對教徒的迫害等原因，支出金額有所降低
1595 年以後	12,000-16,000 杜卡多 / 年	
禁教令正式頒佈後約 10,000 杜卡多 / 年		

表 3. 日本耶穌會年度經費支出情況。

傳教佈道

三

耶穌會利用自身之便，加入到日葡貿易中來，而在日葡所有的貿易商品中，耶穌會涉足最多的當屬中日的生絲貿易。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所有的貿易商品中，生絲在日本的市場需求量最大。日本也生產絲，但是品質遠遠比不上中國。再者因為戰亂關係，日本的絲產量更是大幅度下降。因此，日本的上層階級十分珍視中國的生絲，這也是日本和明朝貿易的原動力。由於倭寇的盛行，日本和明朝的貿易一度中斷，葡萄牙人便迅速地瞄準這個商機，以澳門為據點源源不斷地將中國的生絲銷往日本這個市場以獲得巨利。耶穌會也利用自身之便，參與到這個市場需求量極大的生絲貿易中來。

其次，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生絲利潤很高。關於生絲利潤率的問題，很多史料中都有記載。根據當年生絲貨源的多少、品質的好壞，以及國內市場情況的不同，利潤率也不一樣，但是記載最多的則為50%。1620年2月10日，從澳門寄出，由維埃拉等神父聯名寫給總會長的信中，提到了運往日本的生絲的利潤。稱曰：

一匹生絲¹⁴的價格每年都有波動，但是在當地（澳門，筆者註）大概都為一百克魯紫多。這些運到日本以後，價格升至一百八十、一百九十甚至兩百不等。而有些年份由於澳門市的規定只能用由阿爾馬薩銷售，價格大約只停留在一百六十而已。除去支付給甲比丹的運費（佔10%），扣除納給市裡的稅務（佔3%），再減去其他的一些經費，每年大概能有50%左右的利潤率。¹⁵

如史料所示，雖然生絲的價格每年都會有變動，但是大體上每年都能獲得50%的利潤收入。稍提一下，這裡所指的利益率是一攬子買賣內的收益，一攬子買賣外的收益則遠高於50%。

再者在1616年3月8日賽比諾拉於長崎寄給總會長的信中亦出現了同樣的數字——50%。

（前略）用那些錢購買生絲的話，至少能夠獲得50%的利益，但是這筆錢在澳門已經花掉了，意味着那筆利益也就消失了。¹⁶

如上一份史料一樣，賽比諾拉的信函中也出現了50%這個數據。50%並不是一個固定值，影響日本生絲利潤率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從眾多史料中可以推測，當時生絲貿易的利潤是比較可觀的。因此，日本耶穌會也看中了這一商機，為了籌措資金積極投入到生絲貿易當中，從生絲貿易謀取在日傳教所需的高額經費。

四

很顯然，日本耶穌會之所以選擇生絲是因為貿易能獲得可觀利潤。日本耶穌會在日葡生絲貿易中的獲利情況是日本耶穌會生絲貿易的關鍵。耶穌會進入日本之後，採取不同的措施籌措傳教經費，其中最重要的財政來源便是日葡生絲貿易的利益。這是因為，生絲貿易在日本能夠獲得巨大的利益，這些利益足以支撐耶穌會在日的大部分經費。根據當時與日本耶穌會相關的文獻史料，以及日本耶穌會會士通信和日記，不僅可以了解耶穌會的具體獲利情況，也可以看出當時日本耶穌會會士與生絲貿易的密切關係。然而，在日本耶穌會的相關文獻中，對於生絲貿易獲利情況的描述大多採用“通常”“每年”這一類時間上的泛指詞，很少會記錄出詳細的年份。

關於日本耶穌會正式參與生絲貿易的時間，在耶穌會的相關文獻上並未曾有過記載。然根據日本學者高瀨弘一郎的考證，提出兩種可能，一是阿爾梅達帶着四千至五千克魯紫多在日本加入耶穌會的1556年，或是葡萄牙人獲得澳門居留權並開始向日本派遣貿易船、開始日葡貿易的1557年。在日本耶穌會早期的通信和文件當中極少關於這一時期生絲貿易的相關

記載，然在 1571 年 11 月 3 日從果阿發出、寄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卡斯帕魯·維雷拉直接提到了生絲貿易的巨額利潤。

生絲貿易的利潤非常大，而另一方面需要經費的傳教團體相對較少，資金大概能達到一萬八千克魯紫多左右。¹⁷

也就是說，從開始貿易到維雷拉寫信的 1571 年為止，日本耶穌會能獲得一萬八千克魯紫多左右的利潤。雖然利潤額為每年還是其他時間我們難以考證，但是依舊可以從此管道窺測到日本耶穌會的生絲獲利情況。

維雷拉在 1572 年 1 月 23 日於印度寄予總會長的信中，更是進一步匯報了 1556 年（或 1557 年）到 1571 年這 14、15 年間，日本耶穌會依靠生絲貿易所擁有的儲蓄情況。

（依靠生絲貿易所積攢下來的）資金不斷地增加，已經達到了二萬克魯紫多。¹⁸

從史料可知，日本耶穌會利用阿爾梅達捐贈的四千至五千克魯紫多的本金，投資於日葡生絲貿易，到十六世紀七十時代左右便獲得了本金四倍左右的積蓄。史料中雖然沒有出現每年的具體利潤額，但是顯示出在生絲貿易早期，日本耶穌會就獲得了極大的利潤。具體到年份的利潤值的相關記載，出現於 1575 年以後的史料當中。卡布拉爾在寫給印度管區代理曼努拉爾·迪瑟拉的信中（1575 年 10 月 2 日）如此稱：

維持日本教會的經費每年約需四千杜卡多以上。這一經費以後也將逐漸增加。
（中略）我認為，在現階段除了依靠這一貿易獲得一定的資金外，並沒有其他的獲得收入的途徑。依靠此貿易所獲得的資金，每年能有前述的四千杜卡多以上。¹⁹

由此史料清晰地表明，到 1575 年為止的許多年裡，日本耶穌會依靠生絲貿易所獲得的利潤值為每年四千杜卡多以上。此外，卡布拉

爾此信函也證實生絲貿易對於日本耶穌會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性。

1579 年 12 月 14 日，洛隆索·梅西亞於日本口之津寄給總會長的信中，有一段關於預測當年生絲貿易利潤的詳細記載。

今年神父們大概能從生絲貿易中獲得大約一萬杜卡多吧。即使是獲得了預計的全部金額，和教會以及教徒們所需要的巨額的經費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²⁰

洛隆索在信中提到，1579 年日本耶穌會預計能從生絲貿易中獲得一萬杜卡多左右的利潤。根據其他史料的考證，到 1579 年為止，日本耶穌會的年度經費大約在六千杜卡多左右²¹，一萬杜卡多的貿易收益足以支撐耶穌會的支出，而並非像洛隆索在信中所說的那樣“是微不足道的”。

另，卡布拉爾在 1583 年 10 月 5 日於澳門寫給總會長的信中稱：

今年也參加了這一貿易，耶穌會士們從澳門運往日本的生絲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我們這些耶穌會士們並不滿足於此。日本的管理財務的司庫²²又按照與其他生絲支付同等價格的約定（購入生絲），以比平底帆船（葡萄牙商船，筆者註）更高的價格銷售出去。並且，在商船停泊的港內將剩餘的生絲全部售出。如此，該神父賺取了約三千乃至四千克魯紫多的利潤。²³

值得一提的是，史料中所描述的購買和銷售生絲的方法並非是教皇和葡萄牙國王所承認並批准的合法程式，即通過阿爾馬薩組織購入規定內的一定量的生絲，並直接依靠葡萄牙商船統一銷售出去。而是管理財務的司庫自身直接參與到貿易中來，以同等價格進貨，卻以高價銷售獲得一定的利益。1583 年通過這種方式所得的利潤值為三千到四千克魯紫多左右，這還不包括日本耶穌會以“阿爾馬薩”程式進行生絲貿易的所得。

傳教佈道

1594年2月8日戈梅斯於長崎寄於總會長的信中，提到了該年生絲貿易的收益預測情況。戈梅斯在信中稱曰：

今年1594年，按照管理財務的司庫的說法，為了支撐管區的日常經費支出，必須要從資產中抽出大概五千塔艾爾（Tael）²⁴。因為從貿易船所獲得的利益預計大概只有三千塔艾爾左右。²⁵

“從貿易船所獲得的利益”是指生絲貿易所得利益，如戈梅斯信中所說預計只有三千塔艾爾。與上文所列的1579年一樣，“三千塔艾爾”只是一個預測的利益收益值，但是在現有的史料中尚未發現耶穌會生絲貿易的實際所得是否與幾封信函中的預測利潤有出入的相關資訊，然而這種預測通常是根據每年的進貨情況、銷售情況及日本國內市場的需求做出的推測，或許二者的出入不會相差太大，從這一點看，幾封信函所提到的數據是很具有史料價值的。

進入十七世紀後，生絲貿易的利潤率進一步提高。筆者所掌握的最詳細的有關耶穌會貿易收入情況的年份為1605年，多個史料都詳細記載了日本耶穌會當年的貿易收入情況。首先是迪奧哥·德·麥斯其塔於1605年3月9日從長崎寄給總會長的信件。信中稱：

今年，依靠從澳門而來，抵達神學院和耶穌會（士）的集中地——長崎的貿易船所帶來的，生絲以及其他物品而得的收入，再加上按照管理財務的司庫的政策所得的收入，除了本金以外一共有二萬五千杜卡多以上的獲利。²⁶

也就是說，耶穌會1605年的貿易獲利額為二萬五千杜卡多左右。同樣的，在麥斯其塔第二天，即3月10日寄給總會長的另一封信中，再次提到了“二萬五千杜卡多”這一貿易利益收入額。

今年貿易船來航，我們在兩三個月內便獲得了二萬五千杜卡多以上的利潤。²⁷

史料中再次說到了1605年的貿易利潤額為二萬五千杜卡多以上。然而，這個數字並非只是生絲貿易的利潤收入，而是日本耶穌會參與的所有貿易（在當時來說，最盛行的除生絲貿易外，還有黃金貿易等）的利潤收入，生絲貿易的具體利潤值在史料中並未出現。但是通過其他大量史料的考證，我們可以知道雖然耶穌會也參與了諸如黃金等的其他貿易但其主流仍當屬生絲貿易，因此在這二萬五千杜卡多的利潤收入中應該有很大一部分出自生絲貿易所得的利益。

根據史料記載，1612、1614、1615三年的生絲貿易利潤是最少的，三年的總利潤值為3,674塔艾爾而已。卡魯巴留在1617年的《辯駁書》中如此寫道：

在過去的九年裡，我們能獲得一點點利潤的航海僅三次而已。（中略）耶穌會得到了通過阿爾馬薩購入若干生絲，並以這些生絲參與到貿易中去的許可，這是非常必要的。按照此法在上述的三次航海當中，（搭乘葡萄牙商船）載來的生絲只有93.63匹而已。（耶穌會）並沒有購入更多生絲的能力。而且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向支那商人們賒買的。總入貨資金為10,666塔艾爾，而利潤為3,674（塔艾爾）。²⁸

根據卡魯巴留的報告，1612、1614、1615三年三次航海，日本耶穌會的生絲貿易總利潤額為3,674塔艾爾。這封信函提到的生絲利潤數據十分的巨細，使此史料價值斐然。然而有一點不得不強調，這是一封針對卡布拉爾、質疑日本耶穌會過度參與贏利性貿易活動而違反了耶穌會清貧原則的指責信，作為一封辯駁信，難免會帶上卡魯巴留的主觀情緒，而使數據出現誇張的情況。然在日本耶穌會的相關史料中確實未曾見到如此具體數據的生絲利潤，故此卡魯巴留提供的數據非常具備參考價值。

關於1623年的日本耶穌會貿易收入情況，可以在陸若漢於1624年1月28日從澳門寄給總會長的信中得以了解。陸若漢在信中提到：

神父賽爾巴斯奇安·維艾拉把管理財務的司庫一職讓予我的時候，我從他那共接手了約為 22,921 塔艾爾的資金。其中，從 1622 年 12 月 1 日到 1623 年 12 月 1 日的一年間，共使用了 10,309 塔艾爾。這是該管區在日本、澳門、科欽的神學院支那傳教上使用的經費。除去這筆支出，資金還剩下 12,612 塔艾爾。在剩餘的資金中，我們用了 10,228 塔艾爾投資了生絲和麝香，這些都運往日本銷售。這兩項的利潤率都為 60%，因此能獲得 6,000 塔艾爾以上的利潤。²⁹

也就是說，1623 年日本耶穌會的貿易利潤額為六千塔艾爾左右。這六千塔艾爾並非生絲貿易一項的收益，還包括了麝香的。如上所述，雖然貿易總收入中包括有其他商品的收入，但其中最大一部分利潤仍來自於生絲貿易所得。

關於日本耶穌會在生絲貿易中所獲得的利潤數據，其他諸多史料也有記載，不過大多數史料均採用籠統的“每年”“通常”這種說法，本研究列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數據，歸納成表 4 以供同類型研究參考。

從表 4 所列出的史料數據可知，日本耶穌會從貿易中獲得的利潤額最高的年份為德川幕府成立的第二年——1605 年，獲得二萬五千杜卡多的貿易總收益額。其中，生絲貿易利潤額不明，但可推測其中大部分為生絲所得利潤。再者，利潤收入最低的為 1612、1614、1615 年三年，三年總收入額才為 3,674 塔艾爾，即平均每年才有純收入 1,224.7 塔艾爾左右。一般情況下，日本耶穌會的生絲貿易利潤在三千至七千杜卡多內波動。也有達到一萬杜卡多以上的年份。總的來說，日本耶穌會的生絲利潤有高有低，並非每年都一樣，但從整體來看利潤值還是比較可觀的。日本耶穌會依靠生絲貿易所得利潤，不但解決了困擾已久的教會財政問題，更是進一步擴大了在日本的傳教事業。生絲貿易的收益逐漸成為了日本耶穌會的經濟基礎，鞏固和擴展了耶穌會在日本的傳教事業。

但是，像這種與世俗利益緊密相連的宗教活動同時也潛伏着巨大的危機，一旦貿易衰退或終結，靠此建立起來的宗教巨塔也將一同倒塌。同樣，完全依賴日本耶穌會士們所進行的葡萄牙人對日貿易，日本統治者禁教令的頒佈，以及迫害傳教士活動的愈演愈烈，日葡貿易必將最終從日本消失。這一點，如同硬幣的兩面，而耶穌會士們和葡萄牙商人們在獲得高額利潤的糖衣中，最初並未透過現象看到這一榮俱榮，一敗皆敗的本質聯繫。這也為幕府之後的禁止日葡貿易、禁止天主教徒在日本傳教埋下了不可逆轉的伏筆。

五

近世，日本耶穌會從事所有的貿易活動，最為基本的方式是參與到葡萄牙商船的生絲貿易中。這些葡萄牙商人們和耶穌會傳教士以澳門為中轉基地，將中國的生絲源源不斷地送入日本市場。日本耶穌會士通過介入中日葡間的生絲貿易來籌措在日傳教經費。前文已經提及，日本耶穌會是因為經濟上的原因參與到生絲貿易中來的，至於生絲貿易是否給耶穌會的財政帶來預期的效果，關於這個問題，筆者根據前文所列表 1 “1579 年來日本耶穌會的經費支出”和表 4 “日本耶穌會生絲貿易利潤額”兩個表，互相對照數值，整理出表 5。

從表 5 可以得知，1579 年前日本耶穌會每年所支持的經費約為 6,000 杜卡多，而相對的生絲貿易利潤額，據已掌握的史料來看，最少的為 4,000 杜卡多 / 年，最多的時候竟可達 18,000-20,000 克魯紫多 / 年。1583 年到 1587 年間，每年的經費支出為 10,000-15,000 杜卡多，而關於生絲貿易收入方面，筆者掌握的最確切的資料只要 1583 年的。1583 年，日本耶穌會以非協定的一攬子買賣價格進行生絲貿易，即並非通過由教皇和葡萄牙國王允許的阿爾馬薩，而是直接由耶穌會管理財務的司庫從葡萄牙商船處，以高價進貨的生絲中獲得的利潤是 3,000-4,000 克魯紫多。除此之外，還有按一攬子買賣進行的生絲貿易的利潤，每年約

傳教佈道

時期	生絲貿易利潤額	史料出處（日文）
1556 年或 1557-1571 年	18,000-20,000 克魯紫多	1571.11.3、1572.1.23 ガスパル・ヴィレラの信件
到 1575 年為止的多年	4,000 杜卡多 / 年	1575.10.2 ガブラルの信件
史料中未有記載 ³⁰	4,000 斯庫特(Scudo) ³¹ 以上	1579.12.5 バリニャーノ的信件
1579 年	10,000 杜卡多（預計）	1579.12.14 ロレンソ・メシア的信件
每年	4,000 杜卡多 / 年	1580.8 バリニャーノ “インドのスマリオ”
1583 年	3,000-4,000 克魯紫多	1583.10.5 ガブラルの信件
每年	6,000-7,000 塔艾爾	
通常	5,000-6,000 杜卡多	1583 バリニャーノ《日本のスマリオ》
史料中未有記載	3,000 克魯紫多	1587.11.27 バリニャーノ的信件
每年	4,000 克魯紫多	158.10.18 バリニャーノ的信件
每年	3,000 克魯紫多（不足）	1590.8 第二次日本耶穌會全體協議會記錄
史料中未有記載	2,000-3,000 塔艾爾	1593.9.25 ゴメスの信件
每年	6,000-7,000 克魯紫多	1593.12.25 カブラルの信件
1594 年	3,000 タエル（預計）	1594.2.8 ゴメスの信件
每年	2,000 塔艾爾	1596.12.17 ガブラルの信件
1605 年	25,000 杜卡多（總利潤額，生絲利益額不明）	1605.3.9、1605.3.10 ディオゴ・デ・メスキータ的信件
1612・1614・1615 年	共 3,674 塔艾爾	1617 カルヴァーリョ《弁駁書》
通常	5,300 杜卡多	1618.10.8 カルロ・スピノラの信件
史料中未有記載	3,000-5,000 克魯紫多	1620.9 日本管區第三目錄
1623 年	6,000 塔艾爾（包含麝香）	1624.1.28 ジョアン・ロドリゲスの信件
不明 ³²	4,002 塔艾爾	《日本不動産目錄》（《日本の不動産のカタログ》）
不明	3,000 克魯紫多以下	《關於貿易》（《貿易について》）

表 4. 日本耶穌會生絲貿易利潤額。

6,000-7,000 塔艾爾。因此，可以推測 1583 年日本耶穌會的生絲貿易利潤額為 9,000-11,000 克魯紫多以上（據高瀨弘一郎研究，1583-1587 年間，塔艾爾與克魯紫多兌換率約為 1:1，即價值等同）。再者，在 1595 年以後，日本耶穌會的年度經費支出額有較大的上升，大概在 12,000-16,000 杜卡多之間，而從筆者掌握的、有確切數據的 1605 年的貿易利潤額來看，該年的貿易利潤值為 25,000 杜卡多，而其中大部分都是依靠生絲貿易所獲得的利益。

可以知道，生絲貿易的利益是非常可觀的，
“可以說，（生絲貿易）是非常重要的收入來

源，（它為日本耶穌會）提供的利潤額大概佔其年度經費支出額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³³。長期困擾日本耶穌會的財政問題，依靠生絲貿易的巨大獲利被很好地解決了。不僅如此，耶穌會在解決了自身財政的窘迫外，更是從中獲得了龐大的利益，雖然這一點在很多耶穌會的正式文獻中都多有辯解，但是我們可以推測耶穌會在日本的傳教事業逐步擴大的時間、速度和規模都是在耶穌會正式參與到日葡貿易之後，且和貿易收入呈現出同步性，這一點和其貿易的巨大獲利情況息息相關。直到日本正式驅逐傳教士、禁止天主教在日本傳教為止，日

年度經費支出	生絲貿易利潤額	
1579 年前 約 6,000 杜卡多 / 年	1556 或 1557-1571 年	18,000-20,000 克魯扎多
	到 1575 年為止多年間	4,000 杜卡多 / 年
	1579 年	10,000 杜卡多 (預測)
1583-1587 年 10,000-15,000 杜卡多	1583 年	3,000-4,000 克魯紮多 (非協定一攬子買賣價格)
		6,000-7,000 塔艾爾
1595 年後 12,000-16,000 杜卡多	1605 年	25,000 杜卡多 (為總貿易利潤額，其中生絲利潤額不明確)

表 5. 日本耶穌會部分年度經費支出與生絲利潤額對比。

本耶穌會會士、傳教團體以及日本基督徒的人數不斷增加，由此，在日傳教經費也急速地上升。在無法依靠教皇和葡萄牙國王年金支持的情況下，日本耶穌會只好將目光轉向貿易。如果沒有從生絲貿易所得的高額利潤，日本耶穌會不可能快速地擴大和成長。生絲貿易對於日本耶穌會來說正如范禮安說的那樣，“我們的生存都維繫在一根絲（生絲，筆者註）上了”。

日本耶穌會的生絲貿易參與，同樣給兩個貿易地長崎和澳門帶來了深遠的影響。雖然承擔着運輸和經營貿易的主要是葡萄牙商人，但是日本耶穌會在整個生絲貿易中卻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沒有耶穌會的存在，葡萄牙人不可能在日本如此順利地進行交易活動。日本耶穌會是澳門長崎生絲貿易的重要仲介者，依靠傳教、語言以及伊伯利亞人的身份，日本耶穌會在這個貿易紐帶上承擔了關鍵的一環。耶穌會最初的仲介作用，甚至在後期逐步達到了壟斷的效果。“教會通過經濟活動，和當時（日本）的權力階層保持着密切的聯繫”，³⁴ 因此葡萄牙商人們不得不依賴日本耶穌會打通通往日本市場的最快捷的路徑。日本的大名，包括將軍們，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得葡萄牙商船帶來的貿易利潤，不得不以允許日本耶穌會在自己的領地上傳教為條件，來吸引商船進入自己的管轄區內。因此，日本耶穌會在日本處於一個十分特殊的位置，在身為聖職者的同時，也承擔着貿易人的角色。長崎和澳門在葡萄牙商人、日本商人（包括將軍和大名），以及日本耶穌會士們的共同作用下，逐漸繁榮發展起來，成為

當時東亞極其重要的貿易港口之一。但是，大部分的日本上層階級們並非真心實意地歡迎天主教的到來，對於他們來說，天主教不過是為了獲得巨大貿易利潤和先進武器的一個附加條件而已，而這個條件他們從一開始就是帶着抵觸心理的。因此，當並不懷着傳教目的的新教國家——荷蘭和英國進入日本，帶來和葡萄牙同樣，甚至更大的貿易利益的時候，日本統治者必然會放棄以傳教為代價的葡萄牙貿易。隨之而來的必然便是對天主教的清算，以及對耶穌會士們的驅逐。葡萄牙商人和耶穌會的撤離並沒有給長崎帶來過大的衝擊，原因首先在於長崎港已經在耶穌會介入的這場貿易中，成長為一座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港口城市了。其次，荷蘭人的到來也迅速彌補了葡萄牙貿易撤走後的缺陷。長崎即使在日本鎖國以後仍舊以特有的姿態顯示其經濟實力。與長崎不同，澳門則無法逃脫因貿易的終結而伴隨的急速衰退。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在貿易中扮演着中轉站角色的澳門，最重要的貿易對象國便是日本，一旦日本終結了和葡萄牙之間的貿易，其中轉地身份也便會逐步喪失。以“生絲之城”繁榮至極、聞名遐邇的澳門，其衰落只是時間的問題。很快的，澳門在日本禁教和鎖國之後急速地陷入窘境之中，直到十七世紀葡萄牙重新調整商業貿易方針後，澳門的情況才開始有所好轉。

在日本統治者正式禁教後不久，日本開始進入鎖國狀態。以往許多研究都認為鎖國的主要目的在於禁止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播。事實上，所謂的禁教，以及對傳教士的驅逐只不過是鎖

傳教佈道



圖 4. 十七世紀初日本南蠻屏風局部。³⁵

國的表面原因，其最根本的原因隱藏在宗教背後的貿易當中。作為天主教在日傳教的主要承擔者——耶穌會從十六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便積極地參與澳門與長崎之間的貿易。令人驚奇的是，原本只是仲介性的兩地貿易，隨着日本與明朝勘合貿易的終結竟成為了日本當時唯一的對外貿易。日本耶穌會和葡萄牙商人們共同佔據着日本廣闊的市場，從壟斷貿易中獲取着巨大的利益。對於日本來說，被迫接受與耶穌會和葡萄牙人的貿易活動亦是無法選擇的事情。“這

種仲介性的，然而又是壟斷性的貿易活動，使得貿易越是取得豐厚的利潤，日本耶穌會在日本，以及澳門和印度的教產機構越是龐大複雜，則意味着這種被貿易連結起來的中日兩方所受的損失越大。德川幕府建立之後，隨着統一國家的形成，從耶穌會和葡萄牙商人手中收回貿易主動權就成為必然的歷史運動。”³⁶1604年絲割符制度的制定以及朱印船的出現，都可以認為是德川幕府為了重新掌握貿易利潤和主導權而採取的重要措施。新教國家的到來，更是



為日本的反擊增加了極大的勝算。一旦日本重新掌握了貿易主動權，耶穌會和葡萄牙商人在日本的地位必然喪失，被驅逐更是必然的結果。德川幕府為了進一步鞏固其成果，選擇了鎖國之路，欲永久性地掌握貿易的主動權。總的來說，所謂的禁教在日本來說是歷史不可逆轉的趨勢，也不過是幕府為鎖國，為防止貿易主動權的再次喪失，為不使國內財富大量外流而使用的美麗藉口。幕府鎖國的真正原因不在宗教而在貿易。對葡萄牙商人和耶穌會的貿易壟斷

的反抗，以及重新奪回貿易主動權才是鎖國真正的原因。

由日本耶穌會介入的日葡生絲貿易，從一開始就顯示出其特殊性，即商人和傳教士共同主宰的貿易活動特徵。這一特殊性給這一貿易披上了其他普通貿易所沒有的外衣，也給這一貿易的生存套上了決定性的枷鎖，同時給參與貿易活動的相關人員和活動所在地都帶來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傳教佈道

註釋：

1. 市，為葡萄牙人對澳門的說法。如前文所說，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各地建立商館或要塞，並將這些附屬集落和國內一樣稱為“市”。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獲得澳門居留權後，將澳門也稱作“市”。
2. 甲比丹·莫爾，亦譯為加比丹·莫爾，葡萄牙商隊船長，同時也指這種制度。甲比丹·莫爾除出任商船船長外，更兼有澳門市的軍事和外交許可權。1623年後，才將其與澳門行政分離開來。
3. 參見[澳]傑弗里·C.岡恩(Geoffrey C. Gunn)著：《澳門史 1557-1999》，秦傳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27頁。
4. 杜卡多(Ducato)金幣，或稱杜卡幣。意大利威尼斯鑄造的金幣，1284-1840年發行，重3.55克。
5. 克魯紫多(Cruzado)，漢籍作“十字錢”，是葡萄牙於1457年開始鑄造的金幣。1克魯紫多相當於400雷阿爾或約等於中國銀1兩(Tael)，是當時葡萄牙流通的貨幣，與歐洲另一種古金幣杜卡多(Ducado)價值等同。
6. [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379頁。
7. [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390頁。
8. [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390頁。
9. 參見[日]アレシャンドウロ・ヴァリニャーノ著：《日本巡察記》，[日]松田毅一（ほか）譯，東京：東洋文庫、平凡社，1990年，第36頁。
10. 參見[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456頁。
11. 參見[日]アレシャンドウロ・ヴァリニャーノ著：《日本巡察記》，[日]松田毅一（ほか）譯，東京：東洋文庫、平凡社，1990年，第140-141頁。
12. 同宿：輔助傳教士們宣傳教理，進行傳教的人。當傳教士們不在的情況下，並協助管理教會，主持日常事務，成為當地教會和教徒的重要支柱。小者：一般從神父和修士或者同宿的隨從做起，幫助其在傳教過程中搬送聖具，照顧其生活等等。同樣輔助傳教士們宣傳教理，進行傳教。看坊：如字面意思，主要是負責留守。傳教士們在某地建立起新的教會後，一般不會留在當地而是繼續去開闢新的教會，那麼則會需要看坊來進行教會的看管，以及對新入信徒們的照顧等等。同宿、小者、看坊三者間的工作有許多重疊的地方。
13. 參見[日]五野井隆史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年，第125頁。
14. 匹，pico，日文為“ピコ”，100斤。
15. 參見[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596頁。
16. 參見[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602頁。
17. 參見[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583頁。
18. 參見[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583頁。
19. 參見[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583頁。
20. 參見[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585頁。
21. 參見[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の世紀—ザビエル渡日から“鎖国”まで》，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第77頁。
22. 管理財務的司庫，Procurador，日語為プロクラドール，文字標記為“財務擔當”。在貿易中有決策和管理作用。
23. 參見[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587頁。
24. 塔艾爾(Tael)，重量單位，二十世紀以前用於遠東地區。1塔艾爾相當於中國白銀計量單位1兩。
25. 參見[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592頁。
26. 參見[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595頁。
27. 參見[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600頁。
28. 參見[日]高瀨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600頁。
29. 參見[日]レオン・パジェス著：《日本切支丹宗門史》，吉田小五郎譯，東京：岩波書店，1983年，第166頁。
30. 史料撰寫年份清楚，然而史料中所提及的生絲貿易收入額的具體年份並未提及。

31. 斯庫多 (Scudo)，歐洲多國曾經使用的貨幣名稱，也稱埃斯庫多 (Escudo)，澳門稱之為“士姑度”。葡萄牙埃斯庫多是 1999 年至加入歐元區之前發行的貨幣。
32. 史料本身撰寫年份亦不清楚。
33. 參見 [日] 高瀬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7 年，第 610 頁。
34. 參見 [日] 高瀬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の世紀—ザビエル渡日から“鎖国”まで》，東京：岩波書店，1993 年，第 86 頁。
35. 引自宋念申：《耶穌會如何在日本獲得成功？》，《澎湃新聞》，2016 年 2 月 25 日，11:04。
36. 參見李小白著：《信仰・利益・權力：基督教布教與日本的選擇》，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86 頁。